

葉石濤的文學歷程與歷史軌跡

Yeh Shih - tao literary history and historical trajectory

林慧姪*

Hui- Jung Lin

摘要

台灣的寫作環境，從日治時期延續到當代，一直都是困厄的崎嶇小徑；但攤開台灣文學地圖，卻是一幅佈滿豐富內涵的特殊風景。這些創景的作家，出生、成長於日本殖民統治下，不幸地度過一個禁錮的年代，爲了延續內在燃燒的文學之火，在政權更迭的過程中，挑戰語言的轉換，蛻變成爲「跨越語言的一代」。然而，走過兩個時代的台灣文學重量級作家，在艱難而倍受無理束縛的環境中，卻激發出更強烈的創作慾望，持守爲文學打仗的犧牲奉獻精神，投入建構台灣文學的行列，葉石濤在歷史軌跡中呈現出來的文學歷程，便是典範之一。日治時期葉石濤所寫的幾篇小說，儘管有濃厚的鄉土色彩，卻是耽美、浪漫的，既沒有政治性也沒有抵抗精神存在，因此形塑出葉石濤文學是受西川滿浪漫、耽美風格所影響，才開始以浪漫抒情主義做爲創作起點的普遍觀點；而支持葉石濤文學從浪漫主義出發說法的有力證據是，他捲入「冀寫實主義」的論爭，導致被歸入西川滿派。戰後，葉石濤參加讀書會，接觸左翼思想，卻也在白色恐怖的威權統治下，遭受逮捕的命運。因爲現實生活流浪漂泊，文學生命被迫空白十四年。一九六五年復出後，小說創作和評論同時邁向高峰。直到統獨論爭不斷的八〇年代，葉石濤著手他的文學史寫作，完成台灣人第一部《台灣文學史綱》，寫出了他完整的台灣文學論，也表達他終極的台灣文學觀；並以打散傳統回憶錄的形式，完成數本真實動人的自傳性小說。本文試圖透過台灣歷史的流變，探索葉石濤跨越兩個時代創作風格歷經的轉折，及其不離台灣土地與人民等核心價值的論述，並從西川滿過世後葉石濤的開誠佈公，揭開日治時期〈冀寫實主義〉論爭的真相。

關鍵字：葉石濤、耽美浪漫主義、冀寫實主義、白色恐怖、寫實主義文學觀、自傳性小說、台灣文學史論

接受刊登日：102年1月31日

* 真理大學台灣文學系專任講師、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研究所博士生
感謝隱名審查委員惠賜寶貴意見，惟一切文責仍應由作者自責。



Abstract

From Japanese Occupation to contemporary era, writing environment in Taiwan is full of distress and tortuousness; but spread out the map of Taiwan literature, it is filled with the rich connotation of special landscape.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these innovative writers, who born and grew up, living in an unfortunately and though era, in order to extend the internal ignition of literary. They challenged the language conversion, becoming “the generation of cross-language” in the process of regime exchange. Walking through two eras, there was much unreasonable restraint in this difficult environment, however, stimulating more strong creation of desire to the literary heavyweight writers in Taiwan, holding sacrifice dedication of the literary war, and invested them to construct the procession of Taiwan Literature. The showing of Yeh’s literature course is one of the models of Taiwan Literature at historical trajectory. In Japanese Occupation, although some of Yeh’s novels has strong local consciousness, these novels was erotic and romantic, neither political nor spirit of resistance. General view of Yeh’s creation (which beginning with romantic lyricism), was affected by Mitsuru Nishikawa’s romantic and erotic style. The strong evidence to support this viewpoint is that: Yeh was involved in a controversy of kuso-realism, and divide into faction of Mitsuru Nishikawa. After the war, Yeh participate in the study group, receiving the left-wing ideology, but Yeh was arrested on the authoritarian domination of white terror. Because vagrant life, Yeh’s literary life has a 14-year gap. Yeh’s novels and comments were climaxed by the comeback at 1965. Until 1980s, Yeh begin his literary history writing, and completing the first Taiwanese Literary History “Outline of Taiwan Literature History . Yeh wrote his Taiwan Literature and express his ultimate literary concept at “Outline of Taiwan Literature History.” And Yeh completing several authentic autobiographical novels, which with dispersed traditional form of memoirs. According to the change of Taiwan’s history,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discover Yeh’s creative style, and the core value of Taiwan’s territory and the people. Moreover, after death of Mitsuru Nishikawa, Yeh Shih-tao reveals the truth and debate of Kuso-realism at Japanese Occupation openly and frankly.

Keywords : Yeh Shih-tao, erotic romanticism, Kuso-realism, White Terror, Realism Viewpoint, Autobiographical novel, Taiwan Literary History



壹、前言

台灣的寫作環境從日治時期到現代，向來都極其匱乏欠缺。在英法等先進國家，出類拔萃的傑出作家，不僅能享受到『名利雙收』的榮耀，在社會上同時倍受尊敬與推崇；一般作家起碼也不致於淪落到『三餐不繼』。然而，在我們這個傷心之地，台灣作家坎坷的命運，向來是有目共睹，毋庸置疑。遑論當今諸多盛年的作家，每每受制於生活的勞碌奔波，無法專注創作而自廢武功；我們的前輩作家，佈滿血跡斑斑的苦難經歷，更令人產生湧自心靈深處的不寒而慄。自我放逐、坐牢、飢餓、病苦似乎成爲台灣作家的家常便飯¹。這真是台灣文學作家深切由衷的感慨，幸好命運坎坷多舛的葉石濤沒有被黑暗吞噬，否則早就闐然無聲，消失不見。

葉石濤在〈作家的條件〉一文曾提到：「……作家必須統合他內心世界的『情』和『智』，才能寫出出類拔萃的小說」²。並屢次聲稱當作家是一種天譴，懷著相似於日本作家太宰治割裂般的人生態度—臉上裝著快樂，心裡藏著苦惱；在幽默的文字背後，隱藏著不爲人知的悲苦。

他認爲作家必須擁有豐沛的情感。然而這股豐沛的感情往往來自作家與生俱來的某種心靈缺陷；是心理的創傷，也可說是根深蒂固的自卑叢結。所以一個擁有健全、正常心靈的人，充其量只能寫出燈火般明亮，技巧完美的作品，缺少陰翳深邃動察中所衍生的吸引力；因爲他無法搔惹出人類深層意識的污穢和齷齪，而這些潛意識世界裏的魑魅魍魎才是決定小說深度的關鍵³。文學創作的『宿命論』確實令人疲軟洩氣，然而古今中外夠格號稱「偉大」的作家，大都能維持豐沛的情感直到瞑目，幾乎毫無例外。能把這種敏銳的心思，悲天憫人的胸懷持續終生而不墜，真不容易。這種珍貴的內在特質，發自於作家生命無盡的燃燒，然而這抹生命火焰般的光輝，卻是來自與生俱來的心靈缺陷，他能審視自己內心世界的混沌和黑暗，才能獲得對普遍人性深刻的洞察⁴。不可諱言的，這是身爲一個作家本身對於天譴宿命，以及作家生命內在情感質地的深刻了解。

此外，葉石濤認爲，一個作家必須具有冷澈的、分析的『理性』。這說明，作家必須擁有獨特的『作家之眼』，也就是具備觀照人類世界形形色色底事象的能力。一個作家若缺乏分析人類活動事跡的獨立『世界觀』，他書寫的小說必然變成空中閣樓般的虛幻。『世界觀』可以靠後天的生活經驗和學習去獲得；廣泛的、零碎的，或者有體系的知識吸收，藉由閱讀哲學、經濟、社會、歷史、科學等典籍去獲得啓示，各種管道的吸收與培養，都是型塑作家的必要條件。這些不容小歎的知識能形成堅強的信念，但建構世界觀的方式，卻須要透過切身經驗來實踐。唯有在苛酷現實生活中的實踐印證下的體驗，才能鍛鑄作家獨特的性情、氣質和闡釋的能力；造就成作家不同凡響的風格。葉石濤也認爲，哲學是學問之母，身爲作家不懂哲學性思考，存在的心靈必然閉鎖而狹隘，最後將導致他無法經由整個人類朝向的未來，分析特殊的、地方性的歷史，以及社會變遷的過程⁵，提昇自己的思想高度。因此，在葉石濤在值青春正盛的生命歷程中，早已大量閱讀奠定日後成爲作家的基礎。

葉石濤曾寫道：「…我之選擇走上寫作之路是自己心甘情願，不敢有絲毫怨言，但總覺得我的生涯旅程充滿荊棘，並不完美。」⁶但在這不完美的旅程當中，他從殖民地時代被壓迫的經驗，一直寫到現時富裕的工商社會的生活困境，落實在這塊土地的人民的生活經驗上，可以說相當反映了台灣這半世紀來歷史滄桑的一面。緣於對台灣文學使徒般的堅持，葉石濤他拒絕噤聲，拒絕缺席，在台灣文學發展的歷程中堅持發言，以書寫作爲一生的勞動，終於也讓自己及其著作，成爲台灣文學史無法被漠視的一部份。

就定義而言：「當某個人主要強調他的個人生活，尤其是他個性的歷史時，我們把這個人用散文

¹ 參見葉石濤〈作家的條件〉（收錄於葉石濤著《作家的條件》，台北，遠景，1981），頁48。

² 同前引書，頁49。

³ 同註1。

⁴ 同註2。

⁵ 同前註。

⁶ 參見葉石濤〈不完美的旅程〉（收錄於葉石濤著《不完美的旅程》，台北，皇冠，1993），頁52。



體寫成的回顧性敘事稱做自傳」⁷。

長久以來，不論在英國還是在法國，政治、文學和藝術界名人所留下來關於他們自己生活敘事的回憶錄稱為自傳。但是，久而久之，人們反而將個人生命當中某些更多關於人而不是關於這些人所參與的事件的回憶錄取名為自傳。在許多人看來，自傳理所當然地屬於回憶錄；但往往在這些作品中，作者賦予當代事件，以及歷史本身的比重經常較作者的個性的比重大得多，因此稱之為回憶錄比稱之為自傳更恰當。這種現象，進一步說明了，在回憶錄中，作者的表現像一個證人：他所持有的，是他的個人視角，而話語敘述的對象則遠遠超出個人範圍，呈現出來的多半是個人所隸屬的社會和歷史團體的歷史⁸。

此外，值得注意的還有「自傳體小說」；19世紀大多數自傳體小說中個人真實性的份量，對於讀者來說並不重要，雖然故事情節和說故事的語氣明顯地像是自傳，但自傳可通過各種方式來表達，如果作者本人都不宣稱自己的文本就是自傳，讀者也沒有必要把它當做自傳來讀，只當它是具有自傳意圖的自傳體小說⁹。這些相關於自傳性小說的論點，無形中轉化些研究過程中對葉石濤創作歷程和歷史軌跡的理解。

葉石濤在自撰的〈年表〉中說，一九五一年「因事辭去永福國小教職。杜門不出，自修自三年。」五〇年代不久，他又無辜地捲入白色恐怖的暗流，被捕入獄。直到解嚴之後，葉石濤才能坦誠的面對自己在五〇年代的白色恐怖遭遇，因此寫了《紅鞋子》、《一個台灣老朽作家的五〇年代》、《台灣男子簡阿淘》、《從府城到舊城—葉石濤的回憶錄》…等自敘性小說，從這些碎裂新創的回憶錄中，我們確實可以對葉石濤的文學歷史和台灣現代的歷史軌跡形成的交叉辯證來一窺究竟。

貳、文學啟蒙——從耽美浪漫思索批判寫實之路徑

葉石濤一生跨越了兩個截然不同的時代；幼年到青春初期在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的巨大陰影下受教育長大；而且他僅受過的高中教育也在帝國統治下，太平洋戰鼓聲下完成。不僅如此，他也曾正式做過帝國二等兵，日本戰敗之後，以波茨坦一等兵退伍。

根據葉石濤在各類回憶文本的描述，我們大致可以型塑出他童年時代的生活場景，以及身居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成長模式，解讀出雙重人格的自我懷疑，瞭解他文學的啟蒙過程和來自各種影響產生的可能性。

葉石濤出生的葉厝，是他童年生活最重要的場景。這座最初由『紅殊舍』起造的木造二樓閣樓，位於打銀街，日治時期名為白金町，戰後改名為民生路，但葉石濤特別偏愛打銀街的舊稱。葉厝分跨打銀街的兩側，由於父親是葉家大房，因此居住在祠堂兩側的廂房，而叔父、叔公們則住在對街的樓房裏；然而葉氏家族仍保持著大家族的生活形態，直到少年時代，他仍依然經常穿越打銀街到對面叔公家找堂兄姐們玩。這是一所三進落的大宅院，可惜戰爭末期就被日本人強制拆除做為「防空空地」¹⁰。

由於祖先來自唐山，在殖民統治下從小就具有漢人意識。但殖民統治的生活，也以雙重人格的方式在家裡、在學校逐漸滲透成形。當時在學校或社會的公開場合，必須講日本話，一舉一動都得模仿日本人；回到家裡，就把日本人相關的一切排除在大門外，過著傳統生活，說台語、拜公媽、到廟宇燒香，偶爾聆聽長輩訴說有關中國大陸的傳承和故事¹¹。

但隨後弟妹也陸續到公學校上學，養成講日本話的習慣。放學回家以後一起做功課，自然會用日

⁷【法】菲力浦·勒熱訥，楊國政譯著（《自傳契約》，北京，三聯，2001），頁3。

⁸ 參見前引書。

⁹ 同前引書，頁13-15。

¹⁰ 參見陳明柔在《葉石濤傳——我的勞動是寫作》中的引述，台北，時報文化，2004年，頁16。

¹¹ 參見葉石濤〈沈痛的告白〉，（收錄於葉石濤著《一個台灣老朽作家的五〇年代》，台北，前衛，1992年），頁7。



語交談，甚至遊戲玩耍時，所講的日本話往往多於台灣話。但會講日本話的父母，從來不講日本話，偶爾在檢查孩子作業時會用日本話糾正，顯現出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仍然得為兒女前途設想的無奈。所以葉石濤自敘：「從公學校到高中時代，我讀的是日文書，講的是日本話，而且自己當了公學校的老師，又被徵兵當了帝國二等兵，從八歲到二十歲，從童年到青年，我幾乎沒機會去講台灣話。」¹²

在葉石濤的人格養成時期，台灣傳統的生活方式、信仰習俗雖仍存在日常生活中，儘管父母堅持講台語，但從小受日本教育的下一代，在語言的運用上已產生自然而然的強烈的傾斜與屈從，代表一個民族思想價值、文化傳承、身份認同的台灣話，幾乎全由殖民者的語言取代。

葉石濤真正接觸文學作品，是從考入台南州立二中時開始，這個高中是日本殖民政府為台灣子弟專設的高中，在一百三十個新生中，日本學生祇佔三十個，其餘都是台灣南部各州最優秀的台灣學子。雖然太平洋戰爭時高中一律採用軍事化管理，學風卻帶有相當濃厚的自由主義色彩。日人師長；去除兩、三位極右派的神道主義者，其餘都和藹可親，民族歧視的情況並不多。葉石濤認為：那時候，日本帝國已經統治台灣四十多年，皇民化教育也相當成功奏效，台灣人的反抗意念微乎其微，因此維持著迷漫和諧的局面¹³。這樣的時代氛圍，無形中也透露出早期葉石濤的文學喜好傾向浪漫主義，缺乏寫實主義抗議精神的背景。

儘管後來變身為沒落的地主階級，家裡仍有餘裕供應葉石濤廣泛的閱讀。先是深奧哲學領域的涉獵，雖然當時不盡然瞭解黑格爾、康德、小林秀雄等哲學家的論述，不過閱讀過程讓葉石濤深刻體驗到：『啃這些深奧的唯心哲學也多少帶給我有關廣大的人類精神領域的知識，因而也窺伺了一些人類精神的複雜結構』¹⁴。哲學之外，他也對人類考古學發生極大的興趣，摩根《古代社會》一書的閱讀，奠定了他認知社會科學的基礎，後來能由此出發，輕易地踏進恩格斯的世界¹⁵。

葉石濤是個比較感性而情緒豐富的人，浪漫的幻想常多於嚴密的思考，因此閱讀的興趣漸轉移到文學。戰爭的敵我關係，把他的閱讀侷限在法國文學，英美文學涉獵的範圍不廣，但當時還是閱讀了狄更斯、薩卡萊、高爾斯華綏、喬伊斯、馬克·吐溫等英美文學經典。由於日本和德國納粹及義大利勾結，大多數人都不願接觸這些國家的文學；但是像赫曼·赫塞和韓斯·卡洛沙或莫拉維亞等知名作家的的小說，葉石濤還是會閱讀¹⁶。雖然身處詭譎的風雲時代，葉石濤文學閱讀的渴求和敏銳，帶領他得以跳脫戰爭秉持意識型態，純粹為文學中某種偉大的品質觸動人心弦。

因此他高中時期，夜以繼日地沉迷於當時殖民地台灣所能買得到的任何中外小說，以日本文學為主，外國文學為輔。這些外國文學中也包括了中國文學；當時每週授課有一小時的漢文課，日本師長多半有漢文的素養，知悉中國人的經典和歷史。雖然部份日本人認為中國文學落後而野蠻，但葉石濤靠著日文譯本讀過中國白話小說《金瓶梅》、《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甚至是魯迅的《阿Q正傳》、郁達夫的《沈淪》，起碼認識了中國近代知識份子，也如台灣知識份子一樣富於懷疑性和思考性，他們對人類的福祉和未來遠景皆有深刻的關懷¹⁷。中國白話小說和現代小說，固然有無法取代的精隨，但實際上，要透過這有限的中國古典名著和中國現代文學去瞭解複雜的大陸政治情況終究是某種幻想的途徑。

文學少年的大量閱讀，激起了文藝青年的創作慾望，於是葉石濤開始模仿起心愛的作家開始寫起小說。葉石濤自述：「我並不喜歡日本近代文學主流的寫實主義和自然主義。我比較喜歡故事性強、富於幻想、個性和氣質發揮的淋漓盡致的浪漫主義文學。」¹⁸當時台灣有兩本純文學雜誌，其一是日人作家西川滿主編的《文藝台灣》，其二是台灣作家張文環主編的《台灣文學》，兩本都是清一色的日

¹² 參見葉石濤〈說日語的那段童年生活〉，（收錄於葉石濤著《府城瑣憶》，高雄鳳山，派色文化，1996年），頁 65-66。

¹³ 同註 11，頁 9-10。

¹⁴ 同前註，頁 11。

¹⁵ 同前註。

¹⁶ 同前註，頁 11-12。

¹⁷ 同前註，頁 13-14。

¹⁸ 同前註，頁 14-15。



文雜誌。《文藝台灣》格調耽美而浪漫，每一期封面、插圖都配合画伯立石鐵臣、宮田彌太郎的版面，深深吸引葉石濤；至於《台灣文學》現實主義的批判風格，則讓葉石濤認為缺少情趣、格調太過暗澹。於是開始投稿給《文藝台灣》，第三篇小說〈林君寄來的信〉，終於得到西川滿青睞，一九四三年四月刊登在《文藝台灣》，是一篇徹底發揮幻想能力、展現內心憧憬的浪漫主義作品。同年七月，另一篇小說〈春怨〉再次刊登在《文藝台灣》；〈春怨〉有一個副題『獻給恩師』，在文獻找不到確實的說法——恩師是指誰？但內容則有多處暗示就是西川滿¹⁹。這也是一篇典型的表現浪漫主義思想的示範作品，完全靠想像完成。

一九四三年三月，葉石濤完成五年制的中學教育，從台南一中畢業，到台北，應「文藝台灣社」之聘，擔任《文藝台灣》助理編輯，西川滿是社長。根據葉石濤曾自述：名為「編輯」，「幫忙他做一些編務雜事，其實說穿了我不折不扣的書僮，這一去是幫西川滿先生看稿，跑印刷所校對，去郵局寄發書本，有時需要到總督府去，看雜誌的內容是否通過檢查等，雜事很多。²⁰

日治時期，日人在台作家西川滿由於家族庇蔭，與官方關係匪淺，三歲隨雙親來台，只有大學教育回到日本早稻田大學唸法國文學系，學成立即返台，在新聞界工作，負責報紙的學藝欄，創辦出版社，沒有任何後顧之憂地投入文學與藝術，毫無台灣作家的經濟和政治立場顧慮。西川滿的身份和家庭，根本得不到大部分受過三〇年代普羅思潮洗禮的作家認同，關於他的任何言語不可能獲得台灣作家沒有保留的信任。但畢竟是日本統治當局最信任的文人，皇民化運動中，西川滿都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具有台灣意識的作家絕對無法相信西川滿扮演的是無害角色。因此有張文環的另起爐灶，創辦《台灣文學》。

葉石濤回憶說，他加入『文藝台灣社』的陣營不久，一九四三年七月，小說〈春怨〉又在《文藝台灣》上面刊登出來。至此，他不但認為在人生道路上，選擇文學，選擇當作家這門行業，是走對了路，而且更確定自己的文學思想、文學主張是正確的，心高氣傲之餘，他「在《興南新聞》（原為《台灣新民報》）投寄痛罵〈冀寫實主義〉的一文，極力擁護浪漫主義²¹」，從此與張文環等作家結下樑子。他說，以『世外民』為首的台灣作家指責他是『偽浪漫主義者』，對他展開一連串的猛烈圍剿，他也再度以〈給世氏的公開信〉回應，極力維護自己的文學主張。同時張文環、呂赫若等前輩作家也連袂找到他在下奎府的住所；朋友們繪聲繪影告訴他，這些前輩作家氣勢洶洶，似乎目的在揍葉石濤一頓以便洩憤²²，不過這個台灣文學史上的汗點般的秘辛，在西川滿逝世後解答終於翻案。

陳明柔著作的『葉石濤傳』《我的勞動是寫作》一書中寫道：「然而在西川滿逝世之後，葉石名字發表。但這個說法由於當事人西川滿已過世，無法求證，而成了另一個公案。濤卻又指出〈給世氏的公開信〉執筆者是西川滿而不是他，該文只是西川滿借用了葉石濤的」，「然而無論作者是誰，葉石濤對於自己當日擁護浪漫主義的文學主張，倒是一派坦然未曾閃躲。他曾在一場關於『冀寫實主義事件』解密」的座談會中，說明當日之所以答應西川滿以「葉石濤」的署名發表文章的要求，除了因為無法拂道的師生倫理之外，更因為當時他認為自己也是浪漫派者，也贊成該篇文章的部分主張。雖然葉石濤在事隔半世紀以上，才提出此一翻案說法，且因西川滿也辭世，致使全案徒留懸疑²³。」「但是這個事件也讓我們看到，葉石濤懷抱著文學夢想投身文壇立志創作，都將自己置於兩個相對抗的文學集團之間，並在無意間捲入文學事件中²⁴」。

西川滿雖然是台灣文學史上爭議性的人物，但對葉石濤而言，他在西川滿的身上看到了一個作家的基本條件：那便是作家要認真生活，刻苦過日，孜孜不倦地寫到死。簡言之，作家必須是人道主義者，奉獻和獻身是作家唯一的報酬。西川先生雖然屬於統治階級，少不了有民族優越感的一份高傲，

¹⁹ 參見彭瑞金《葉石濤評傳》，高雄，春暉，1998年，頁97。

²⁰ 同前註，頁83-84。

²¹ 彭瑞金《葉石濤評傳》，高雄，春暉，1998年，頁89-90。

²² 同前註，頁90。

²³ 陳明柔《葉石濤傳—我的勞動是寫作》，台北，時報文化，2004年，頁63。

²⁴ 同前註。



他的文學是耽美而浪漫，但是對文學的執著和奉獻精神卻是有值得人稱道的地方²⁵。儘管後來葉石濤的文學思想逐漸改變，由浪漫的藝術至上走向批判寫實主義，也因對西川滿的外地文學的主張——即把台灣文學看做是日本文學的延長有所懷疑，但奠定了成為作家的職志，可說是這段時間的一大收穫。他從兩個文學陣營的對立夾縫中，認識了台灣新文學苦難的歷史，並且結交了張文環、楊遠、吳濁流、呂赫若、龍瑛宗等可敬的台灣先輩作家，帶來豐富的教益。

參、掙扎與尋覓——從戰後初期、二二八到白色恐怖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透過『玉音放送』，正式宣佈大日本帝國無條件投降。日本天皇歷史性的廣播，意味著台灣人終於擺脫了被殖民的命運，終戰的時刻終於來臨。軍旅中的葉石濤面對台灣人現實處境的改變，以及可能隨之而來的種種，思潮如泉湧般激盪，徹夜未眠。雖然未來的一切仍是不可確知，但葉石濤評論戰後初期，認為「這是個黑暗和黎明交替的時代。舊的殖民統治瓦解，新的民主模式還沒建立」²⁶返鄉途中，夢想著自己「未來的文學生涯，如何去學習中國語文重新做一個道地的中國作家」²⁷，在戰後不能確定的年代中，努力地重新學習中文，希望日後能以熟練的中文與戰後的台灣作家接軌，以觀察者的身份凝視台灣社會變異與發展。但事實上他對中國的瞭解只是基於漢人的生活習性以及漢民族感情的淵源，透過閱讀認識中國，其實與中國的歷史是有隔閡的；而且在葉石濤接受的養成教育中，並沒有機會深入接觸台灣人的抵抗運動和新文學運動。但根據彭瑞金所言：「葉石濤並沒因改朝換代而中斷創作，戰後，一九四六年三月，他在龍瑛宗主持的「中華日報日文欄」繼續以日文創作。一九四七年八月創立的「新生報橋副刊」也接納日文創作的投稿，在請人譯成漢文刊出，他也因在日文欄發表作品的關係，受到邀稿，展開他戰後初期的創作新史頁，有為數可觀的小說、隨筆、評論發表。」²⁸但創作生命熾烈的作家生命，卻因意外遭逢白色恐怖的割裂，飽嘗不堪為人言道的悲苦，以及沁入生命內裡屢屢威脅生存辛酸。

戰後葉石濤由於家道中落及現實生活的需求，很快復職回到戰前任教，戰後改名為『立人國校』的小學教書，因為一九五〇年的土地改革，徹底破壞了小地主階級的生活。根據葉石濤的理解：「對大多數沒有田地的台灣佃農而言，土地改革，是在台灣歷史未曾有過的翻身時刻。對擁有幾百甲田產的大地主而言，他們的吃虧也很少；他們的資產只不過是從農業轉到工業而已，他們並未因此而淪為三餐不濟的窮人。反而，他們之中大多數人因而與新興的工業生產制度掛鉤，愈來愈富。在這土地改革中，受傷害最重，乃是像我家一樣的小地主」²⁹。葉石濤家仍擁有五甲看天田，收益並不高，『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等一連串的土地改革政策實行後，只好賣掉僅剩的三甲田地，在府城購買一間棲身的老屋，本身也由府城地主之子變成完全無地可繼承的『吃頭路人』。

葉石濤曾如此描寫著戰後初期台灣社會的景象：「光復這一段日子過得非常艱辛；幣值暴跌，糧食缺乏，思想行動分歧，滿目瘡痍的一片瓦礫堆，處處都叫人黯然神傷！似乎美好的時光一去不復返了。然而以往台灣歷史的每一個階段何嘗有過美好的時光³⁰。」戰後未及整復的學校如同廢墟一般，課桌椅破爛不堪，絕大多數的台灣人教師對於中國語文一竅不通。因無法再以日語教學，台灣籍的教師們只能勉強以台語授課，但在學校裏以『北平官話』授課，成為必然的態勢。語文轉換的隔閡與窘礙，因此也成了戰後局勢動盪、物質乏困的處境之外，台灣人生活中必須立即面對的另一個問題。尤

²⁵ 葉石濤《一個台灣老朽作家的五〇年代》，台北，前衛，1992年，頁16。

²⁶ 陳明柔《葉石濤傳—我的勞動是寫作》，台北，時報文化，2004年，頁76。

²⁷ 同前註。

²⁸ 葉石濤作《葉石濤全集 1-5，小說卷》，〔收錄於彭瑞金著〈為台灣文學點燈、開路、立座標〉，高雄，高雄市文化局，2006年〕，頁22。

²⁹ 葉石濤《點鬼簿》，〔收錄於葉石濤著《府城瑣憶》，高雄鳳山，派色文化，1996年〕，頁20-23。

³⁰ 同註27，頁30。



其是對台灣知識份子而言，在日文被全面廢止之後，語文轉換的焦慮更為迫切³¹。如同「跨越語言的一代」，葉石濤與同期的作家，為了延續文學創作的生命熱忱，重新學習【國語】，在類似的文學經歷中，同樣反映了文學的滄桑和傷痕。

語言的轉換不再是回歸漢族文化的美麗憧憬，在廢除日文、全面推動北京官話的語言政策下，已成為知識份子生存的焦慮。語言轉換所造成的困局，是台灣戰後每一個原本以日文為思考書寫工具的台灣作家，必須匍匐而過的泥濘地。也許台灣作家可以選擇拒絕以中文創作、發表作品，但是一個偉大的作家，不但能用批判性的寫實手法來描寫漸趨毀滅的舊事物，而且也能夠見到新生事物的萌芽，在人們心裏點燃光明溫暖的夢想，說出人們的共同經驗及共同意願——即人們心目中的美和醜、憧憬和失望、快樂和悲傷。因此作家需要讀者閱讀作品，在讀者能理解、接受或產生共鳴時，賦予文學真實的生命，否則沒有讀者閱讀的文學作品，再偉大的鉅著也顯示不出文學的觀察和影響力，以及與讀者共同營造、體會時代和歷史產生的寶貴經驗，擺脫人類不幸的枷鎖與命運。

葉石濤的歷史解釋認為「二二八的時候，台灣民政缺乏任何組織，因而臨時組成的二二八處理委員，可以信賴的是台灣人的人道主義和守法倫理。但是在處理政治性運作的時候一再犯了錯。它始終不善於跟長官公署爭鬥，但情報失靈，被臥底的抓耙子所搞亂，內部意識型態的分歧異常紊亂，終於未能完成台灣民眾托付的使命。它沒有符合抗爆活動的政治訴求，只留在體制內改革的層面，而且揮之不去祖國夢的陰影。」³²葉石濤就他個人的慘痛經驗，瞭解當時隱晦的史實，他釐清當時的情況，認識到「在二二八的時候，唯一發生微弱影響的是台共；因為在這動盪的烘爐裏，擁有明確的目標、堅定的信念、雛形的組織系統的只是台共而已。說是台共，其實是中共的『省工作委員會』，他們聽命於來自唐山中共的指揮。台共在二二八中茁壯，擴大組織，終於有白色五〇年代的恐怖時期出現。台共除『省工作委員會』之外，還有『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存在。這個組織較有統一陣線的色彩，容納了傾向於『獨立』或『自治』主張的抗議份子。」³³這也是戰後初期四年閱讀和讀書會的人際接觸，沾惹台共份子入獄而理出的歷史脈絡。

在台灣重要的歷史關鍵性時刻，葉石濤明瞭自己是天生的觀察者而不是行動者。他很清楚地認知，在這樣有可能改變台灣命運的時刻裏，最重要的一個掌握時代的脈絡，公正無私地思考台灣未來趨向，剖析事件背後隱藏的事實真相的人³⁴。所以他每天穿梭於府城的大街小巷，仔細目睹了人們的一舉一動和團體行動。二二八平息不久，就在『大正公園』看到日裔台灣人湯德章律師被槍決的悲壯情景。

二二八事件之後，葉石濤寫下最早的政治小說〈三月的媽祖〉。彭瑞金在《葉石濤評傳》中對〈三月的媽祖〉有以下詳盡的文本解：

〈三月的媽祖〉，參加革命行動失敗的律夫，不願再接受同志的庇護，四出逃亡。他記得革命行剛在 N 市發動時，有一位老人由於感激，顫抖著手把武器交給他的兒子，一面流淚，一面微笑，揉著兒子的手掌，把他送出門去戰鬥。但當軍隊開到 N 市的下午，老人痛罵兒子，恐懼的臉孔變青，怕兒子的行為危及到他的生命和財產。三天前，被父親捧為英雄，三天後成為罪種。律夫發覺「花蕊已遭蟲吃掉，神聖的革命只不過被敵人的黨爭利用了。」雖然開始逃亡，他不承認思想的失敗，只是缺少方法和組織，民眾缺乏指導。「他獨自像離群的傷鹿般尋找著最後的安息所。」他終於像賭博一樣，擲出命運的骰子，再也逃不動了，選擇走進一個農村。他不能預料農村的人怎麼處置他，接納他？趕他走，怕受牽連？舉發他，以求自保？都有可能。他在到達村子的時候大概由於餓，累昏睡過去了。昏睡中想起『我的媽祖』，一個在他失業時，供養他的女子，他那因過勞，已去世的妻子。醒來時，已經在農民的家裡。

³¹ 同前註。

³² 葉石濤〈說日語的那段童年生活〉，（收錄於葉石濤著《府城瑣憶》，高雄鳳山，派色文化，1996年），頁 65-66。

³³ 同前引書，頁 51-52。

³⁴ 同前註，頁 52。



律夫想農夫已經知道他的來歷，也坦白說出自己的身份，並請老農夫決定他的命運。老農夫嚴肅地問他：「你豈不是殺了人？」脫了牙的老太婆問他：「你是做了好事的嗎？」年輕的農夫則問：「你為什麼跑到這裡來？為什麼你特地選擇了我們的鄉村呢？」律夫表示：「我並沒有殺過人——但為了大多數生存的必要，我希望我能夠殺人。」「你們也會覺得殺死了那種人等於是做好事。」「我並不是特別地選這裡來的。因為沒有人要藏我，我也不想麻煩別人所以一直逃跑而為了疲勞而在這裡倒下來的…」律夫說完又疲累的睡去，模糊中聽到女人的聲音為他懇求，讓他繼續睡，他看起來是善良的人，村里沒有軍隊駐紮，外人也很少來，危險不會立即出現，他的心底又升起媽祖的聲音。小說的結尾暗示律夫已融入這塊勞動者的天地³⁵。

葉石濤透過小說的書寫，見證歷史、記錄歷史，解析他對二二八失敗的理解，剖析人性的勇敢與怯懦，以及是非公理的價值判斷，寫出台灣農民的單純良善和理智，以媽祖的意象，彰顯台灣女性的包容與溫柔的愛，救苦救難，為人類的痛楚解厄消災，使挫敗者重拾對鄉土的信心，親自以勞動血汗融入摯愛的土地，完成台灣人自我價值的肯定和認同，以祈得到最終的救贖。卻也在無形中流露出強韌的女性意識，暗示男性的自私、怕事，和女性的寬容相形見绌。

四年間，葉石濤深覺心靈上的收穫最豐富，因為讀了許多來自中國的書籍：包括所有白話古典小說及三〇年代作家的無數傑作，以及中共以馬克斯主義為基礎建構的未來中國烏托邦藍圖。除了中國文學之外，也看到了日治時期未能普遍發行的台灣作家的作品，再一次反思台灣新文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此外，也閱讀蘇聯文學的中譯本，並欣賞過公開放映的蘇聯電影，能藉由這些途徑思考住在另一種政治環境截然不同土地上的人民的現實生活。

粗暴的語言政策，關閉了龍瑛宗在《中華日報》主持的『日文欄』，原本一直在這塊園地發表作品的葉石濤，也因『日文欄』結束之後，大概一時也沒有合適的園地，他「只好輟筆不寫了」，「一直到中華日報副刊的『海風』與新生報『橋』出現以後，才重新操筆寫起文章來。」他說：「在『海風』和『橋』副刊寫作時，「已是另一番光景，除去幾篇文章翻譯以外，直到民國四十年我仍然不停的寫下去。但已經廢棄日文不用，差不多都是中文作品。」³⁶這段告白說明，戰後的五、六年間，他無論是否參加抬面上的文學活動，不問是否在寫作，他都在為當一個中文作家做準備，他不像某些作家採取抗拒、有些人選擇退怯，有些人則自怨自艾，他似乎以宿命論接受了這個必然成為中文作家的命運，只顧埋頭準備，他應該是最早掙脫語言桎梏的日治作家之一³⁷。

由於戰後初期讀了一些『匪共』書籍的嫌疑，又牽涉到改組後的省重整工作委員會的案件，一九五一年秋天被捕，從此過著杜門不出，槌胸痛苦，日夜懺悔的幾達三個月的漫漫長夜³⁸。直到解嚴後才開始敢以自傳性小說描述自己的遭遇，寫出戰後國共政治思想相互交纏滲透的大環境，以及知識分子在疑惑當中面臨國家機器掌控的殘酷與荒謬。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美國基於反共戰略的考量，支持敗退台灣的國民黨政權，在台灣進行持續性、廣泛而殘酷的政治撲殺運動。據保守的估計，在這場長達五年的巨大恐怖政治中，國民黨政權在台灣殺害了至少四千至五千個，乃至於八千個以上的本省和外省的『共匪』、愛國主義知識份子、文化人、工人和農民，並將同樣數目的人投入十年以上到無期徒刑的牢獄之中。這就是一般所謂的五〇年代台灣的白色恐怖³⁹。「冷戰」一次的根源，顯然來自民主自由陣營和共產國際陣營的拉鋸，然而，台灣「白色恐怖」的歷史傷痕，其正當性的背後，卻也揭示了國民政府在國共內戰中失去政權的挫敗，圍堵因共產思想撼動政權再次流亡的恐懼與焦慮。

既然稱為『白色恐怖』，可想而知，它主要的施行對象是一般所說的左翼人士和運動。因此，在

³⁵ 彭瑞金《葉石濤評傳》，高雄，春暉，1998年，頁130-131。

³⁶ 同前引書，頁120。

³⁷ 同前引書，頁121-122。

³⁸ 同註32，頁57。

³⁹ 參見藍博洲《白色恐怖》，台北，揚智，1993年，頁21。



具有戰後新殖民社會的性格地區裏，爭取民族解放和民主改革的運動中，以社會主義理念為指導宗旨的團體，常常便是不分國界的白色恐怖政策的標的物⁴⁰。國民政府因為在大陸戰場挫敗，『恐共·恨共』心結因而特別深刻，政策上的殘酷性也就特別突出，因為過去來自左翼文學宣傳力量揭露政治現實的深刻傷痕，於公於私，早已宣染成 1949 年大陸風雲變色斷尾求生，隱忍遷台的政治意識和集體經驗。然而，知識份子面對二二八事件和國共內戰後的餘生，也衍生出亟欲突破重圍的意識型態，透過堅定的信仰在鋼索上遊走，罔顧個人在覺悟下的犧牲。

五〇年代的白色恐怖對於台灣前進的知識份子而言，是史無前例的一場大浩劫。眾多的台灣菁英因而喪命或在牢裡度過大半生，無聲無息地與草木同朽。這些苦難歷史一直埋葬在台灣歷史的墳墓裡，台灣民眾不是一無所知就是因為害怕而噤若寒蟬。像葉石濤一樣，犯了知情不報的這一類政治犯，其實都是冤枉被關的人。他被判有期徒刑五年，犯的是『檢肅匪諜條例』第九條的知情不報，罪名冠冕堂皇，真像有這麼一回事。其實說穿了，祇是戰後不久跟一個學長有往來，向他買了幾本『匪黨』刊物來看而已，卻因此被歧視為瘟神，人人迴避，工作不順，徒然蹉跎歲月，喪盡一個人的尊嚴和做人的條件。

肆、一個斷裂時代下一台灣文學史的里程碑

對於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四年這段被囚的經驗，直到七〇年代中期，葉石濤仍不願直陳其事。在其自傳的寫作年表中，於一九五一年的記事，即被記述為：「因事辭去永福國小教職。杜門不出，自修自學三年。」即便事隔廿年，作家仍選擇以「杜門不出，自修自學」這樣的一形容詞，隱喻實際痛苦承受過的牢獄之災，而如此曲折的指陳，其實也隱涵著社會集體對白色恐怖惴惴不安的惶恐心態⁴¹。直到八〇年代解嚴之後，才敢撤除心中的警總，以大量書寫傳述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及自身的遭遇。

日後葉石濤一直在小學擔任教職，但出獄之初在現實生活中到處碰壁，屢被派遣至鄉下、山上偏遠小學，直到一九六七年調任高雄縣橋頭甲圍國小，才結束流浪教師的歲月。

隱居於貧瘠的荒村，汲汲營營現實生活十餘年，創作的活力在困蹙生活中被磨損殆盡，經濟拮据讓他沒有餘錢購買新刊的雜誌書籍，出獄之後葉石濤與台灣文壇完全失去聯繫。所以一九六五年時，當他發現竟有一群戰後出身的台灣作家活躍於台灣文壇時，心中震驚無比，也激起了他再度創作的欲望。然而此際懷抱的不再是浪漫的文學想像，而是以凝視現實的寫實堅持，重新提筆，再次投入台灣文學創作的行列⁴²。因此當他在一九六五年深秋，於「街坊書攤看到一套十本文壇社出版的『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他的驚愕與喜悅難以言喻的。因為他從未想到在「二十年的蹉跎時間裏，新一代台灣作家已掙脫了時代與社會的重重枷鎖，重新上路，成為民眾生活的見證人。」在這樣的刺激下，葉石濤重燃起創作的熱力，開始發表作品。

儘管當時鍾肇政已發表長篇小說《魯冰花》，一九六五年主編《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十冊（文壇社出版），以及『台灣省青年文學叢書』十冊（幼獅文化出版），在台灣『光復』二十週年時，以台灣作家二十年來努力的成果，向國民政府當局展現台灣作家的成績，證明台灣作家的創作實力。

自一九六五年同時發表小說與評論付出文壇以來，短短四年間葉石濤已累積了數十篇小說與評論的成果，一九六八年六月出版第一本小說集《葫蘆巷春夢》，三個月之後，又出版生平第一本評論集《葉石濤評論集》，逐漸受文壇肯定。

七〇年代中葉以後，葉石濤將其心力投注於文學評論與台灣文學史論的建構。一九六五年十一月發表〈台灣的鄉土文學〉，決心為台灣文學立史。他在文中寫道：「我渴望著蒼天賜我這麼一個能力，

⁴⁰ 同前引書，頁 41。

⁴¹ 參見陳明柔《葉石濤傳—我的勞動是寫作》，台北，時報文化，2004 年，頁 120。

⁴² 同前引書，頁 133。



能夠把本省籍作家的生平、作品，有系統的加以整理，寫成一部部鄉土文學史⁴³。」以此向日治時期寫過一篇〈台灣文學史序說〉登於日人西川滿主編的《文藝台灣》的黃得時脫帽致敬肯定這部作品的歷史意義；因為他在日本人壓制之下，敢於放下這一塊沈重的礎石。⁴⁴具體而言，陳芳明認為葉石濤在這段時期已經意識到撰寫文學史的抵抗寓意。他願意向黃得時脫帽致敬，主要是在日本人的殖民下，台灣知識份子仍然堅持保存歷史記憶，從而向統治者發出被壓迫者的聲音。藉由黃得時的處境，葉石濤也在暗示自己的時代⁴⁵。面對這樣的文學處境，葉石濤試圖闡述台灣文學的正當性和主體性，隨著逐漸鬆動的集體政權，把文學的主權還給人民。

更值得討論的是，他在文中已粗略為台灣文學做了分期的工作。亦即把台灣作家劃分成『戰前派』、『戰中派』與『戰後派』三個時期。從賴和到呂赫若的寫實主義作家，被劃歸為戰前派；而皇民化運動提倡時期的作家如陳火泉、王昶雄等人則屬戰中派。鍾理和、鍾肇政以降的作家，則列入戰後派。陳芳明指稱，這種分期的方式，已很明顯的把他們視為一脈相承的文學傳統，其中並沒有出現斷裂。這種把歷史想像當作連續不斷的記憶，似乎有兩種強烈的暗示。第一，葉石濤有意透過歷史書寫來建立他的『台灣圖像』，而這樣的圖像，顯然有別於官方所構築的『中國圖像』。第二，不僅如此，在台灣文學受到壓制、貶抑的時期，葉石濤的書寫企圖重建另一個文學傳統，使台灣社會掙脫被邊緣化的角色，從而能夠建立具備自我性格的文字主體。⁴⁶在八〇年代——一個統獨爭論不休的年代，葉石濤已默默完成他的文學史思想準備，開始著手建構台灣人書寫的第一本台灣文學史。

而且，葉石濤在為彭瑞金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撰寫書評時，特別強調台灣文學發展的一貫性，他說：「我們之所以把戰前的新文學與戰後的台灣文學看做是割裂不開的整體完全的文學，其原因在於我們認為台灣文學是世界文學的一環，而不是附屬於任何一個外來統治民族的附庸文學。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絕非日本的『外地文學』，也並非日本文學的延伸。戰後的台灣文學也絕非中國文學的一環，隸屬於中國文學。」⁴⁷在六〇年代，正是盛權體制臻於高峰的時期，凡涉及台灣的任何研究都受到排斥或敵視。對當權者來說，台灣文學的傳承是可以切斷的，甚至可以說，台灣文學是未曾存在的。葉石濤以通史的觀點，證明戰前台灣文學不僅存在，而且還與戰後世代作家銜接起來⁴⁸。所以葉石濤的台灣文學觀點誠如本身闡述的說明，讓我們了解：「台灣文學不屬於中國文學或日本文學，它是獨立的文學，屬於世界文學的一環。台灣文學裡包括四百多年的古典文學，幾千年的原住民口傳文學和現代文學，日治時代新文學，戰後現代文學，日治時代新文學，以及母語文學為主的民間文學。」

49

在凝鑄他的史觀過程中，葉石濤刻意建立鄉土文學的概念，自然有其特定的空間意識與時間意識。所謂空間意識，當是指文學所孕育產生的社會背景與土地環境。而所謂時間意識，則是指文學傳承的淵源及其流變的歷史，這是葉石濤最堅持的見解⁵⁰。因為台灣文學反映了台灣土地和人民的真實生活。

葉石濤建構台灣文學理論的觀察入口，引起各方議論的〈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一文，發表於一九七七年鄉土文學論戰烽火方熾之際，正是葉石濤提出的雄辯證詞。這篇文章的重要意義，在於他在『鄉土文學』的基礎之上，又進一步發展出『鄉土文學史』的概念。認為在台灣土地的氣氛薰陶下，

⁴³ 葉石濤《台灣鄉土作家論集》，台北，遠景，1979年，頁27。

⁴⁴ 同前註。

⁴⁵ 參見陳芳明〈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觀之建構〉，（收錄於陳芳明著《後殖民台灣》，台北，麥田，2002年），頁49。

⁴⁶ 同前引書，頁50。

⁴⁷ 同前註。

⁴⁸ 同前註。

⁴⁹ 葉石濤著，〈自序〉（收錄於葉石濤作，《葉石濤全集.1-5，小說卷》，高雄市，高雄市文化局，2006年），頁9。

⁵⁰ 同前引書，頁51。



台灣文學就不能擺脫島上的種族經驗與殖民經驗⁵¹。台灣文學具有中國的普遍性，但在島上特殊經驗的洗禮之下，已發展出與中國文學殊異的精神與內容。⁵²在葉石濤史觀的建構過程中，台灣意識的提出，是非常果敢而具有突破性的主張，而台灣意識乃建基在島上的殖民經驗之上，是被殖民的、受壓迫的共同經驗。⁵³葉石濤總是不忘其歷史意識的整體性，認為台灣文學固然有其特殊的風土環境與殖民經驗，它的成長歷程絕對不是孤立的，而是不時吸收外來文化資源，因此台灣的本土文化內容就因此益形豐饒且繁複⁵⁴。我們理解的是：這些論點確實是建立在理性、科學的考察，以及台灣歷史一路走來的具體經驗，絕非口號般的意識型態堅持或情緒性的強行置入。

《台灣文學史綱》在史觀的建構過程中，左派觀點的寫實主義就變成不可分割的一環。以社會主義的信仰為基礎，《史綱》中的歷史敘述自然就沾染了高度的左翼色彩⁵⁵。七〇年代鄉土文學的洗禮後，台灣作家才成功地為「台灣文學」定名。儘管有人仍然反對使用『台灣文學』的名稱，但文學本身的內容與精神，這絕對不是其他社會產生的文學能取代的⁵⁶。完成《台灣文學史綱》之後的葉石濤，基本上已為台灣文學本土運動豎起了一座雄辯的里程碑，完成了階段性的任務。

葉石濤進入八〇年代之後，開始大量撰寫回憶文字。關於個人身世記憶的書寫，不論其筆法是記實或虛構，但大體上仍是以作家現身說法的雜文、散文形式面世。一九八二年出版的《文學回憶錄》雖名為回憶錄卻不具系統性，其中收錄的文章頗為龐雜，時而日治時期，時而戰後台灣，同涵括了文學評論、書序、文壇郊遊、創作生涯鎖憶等題材，也為台灣文學留下其「現身說法」的史料⁵⁷。葉石濤討厭喋喋不休地談論自己，但他寫的都是自己的經驗，生活週遭的人與事，旁門左道的回憶錄書寫中，一直保留著黑色幽默的自我調侃。

至於一九八六年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女朋友》則像是葉石濤個人的青春記事簿，大多寫戰後初期以前的府城青春夢，並且在描寫四〇年代的篇章中，勾勒出府城的庶民生活，其中對四〇年代府城生活的回顧，也成為其日後部分小說的背景⁵⁸。葉石濤一生重要的雙城—府城和舊城，都是他創作的環境，但細膩綜覽他小說創作的題材，大都以府城為骨幹，來自古都生活週邊的庶民文化、身不由己的個人經驗、豐富多元的歷史時空與記憶，甚至在九〇年代創先拉開西拉雅族文化等種族議題。

葉石濤真正較有系統書寫的回憶錄，其實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一個老朽台灣作家的五〇年代》，書中他自稱是「社會主義思想傾向的新自由主義者」，並且脈絡分明地寫下自己選擇文學為終身志業的心路歷程，具體地描述個人心靈思想的曲折發展。書中也交代了〈幼少年時代〉、〈青年時代〉種種生活細節，同時評述了自己被捕的經過，以及作為一個「(前)政治犯」所面臨的苦痛鬱悶。他也陳述了自己對於五〇年代複雜政治情勢的理解，並描繪出個人際遇與時代變局幽微的關連，這本書十分有系統性地勾勒出童年時期，到五〇年代青年時期的生活經歷與個人思想養成的過程。⁵⁹但在政治解嚴、思想為解嚴，警總特務系同因影仍在的年代，勇闖禁區，以新的題材和筆法，突圍當時仍存在的文學困境。

其實不論是前此以出版的《文學回憶錄》、《女朋友》，或稍後於一九九三年出版的《不完美的旅程》，以及一九九六年出版，以描寫四〇年代記憶為主的《府城鎖憶》，甚或在一九九九年出版的《從府城到舊城——葉石濤回憶錄》。這些憶往文集收入的文章皆似葉石濤生命記事的切片，從各個角度記錄他所經歷的事件，以及他觀察台灣歷史、文學、社會的心得，這些切片的交疊拼貼出葉石濤一生

⁵¹ 同前註，頁 52。

⁵² 同前註。

⁵³ 同前註。

⁵⁴ 同前引書，頁 55。

⁵⁵ 同前註，頁 59。

⁵⁶ 同前註，頁 60-61。

⁵⁷ 參見陳明柔《葉石濤傳—我的勞動是寫作》，台北，時報文化，2004年，頁 196。

⁵⁸ 同前註。

⁵⁹ 同前引書，頁 199。



的悲喜。⁶⁰但他的文學悲情，跨越了日治末期和白色恐怖，文本中揭露的重重禁錮與黑幕，開拓並解放了台灣的創作題材和視野。

八〇年代台灣社會汲汲於重構台灣歷史，彰顯主體意識，積極召喚過去社會現實中不能被融入的歷史記憶，小說家們並且開始嘗試以小說的虛構方式，填補台灣發展進程中，被刻意掩覆斷裂失意的歷史缺口。對於許多曾經被風窒於黑暗角落的歷史禁忌，如日據時代台灣(文學)歷史、二二八事件、四六事件、白色恐怖等塵封的記憶，已開始由社會文化、文學等各個角度，進行歷史的在考據。也就是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之中，葉石濤通過個人生命細節全面書寫，使曾經被封印噤聲的個人記憶大規模出土。這些陸續出土的歷史記憶，不僅是他個人生命經歷的重現，其實也呈現了曾經被刻意掩蓋的歷史之傷痛，以及和他同時代卻被遺忘在歷史幽闇角落裡，那一個世代知識份子的精神樣貌。同時葉石濤也通過《紅鞋子》與《台灣男子簡阿淘》兩本頗具自傳色彩的小說，以虛構形式的經營，試圖再現四、五〇年代台灣知識份子的精神樣貌，並且重現當日台灣庶民生活的實相⁶¹。

葉石濤曾以『吃夢的獸』比喻作家，他說：「作家本來猶如一隻吃夢為生的夢獸，他哪知道這個夢獸也需要靠麵包生活，而麵包並非終日作夢就可以得到的阿！」⁶²

『夢獸』，依憑著文學的夢想而存活。作家葉石濤的確由文學的夢想與熱情出發，孜孜不倦書寫數十年，並由次確立了他在文學使上的位置，但他的一生同時也因這個夢想而吃盡苦頭。數十年窘迫的物質生活，讓作家發生了「麵包並非終日作夢就可以得到的阿！」之哀嘆，然而這樣沈痛的領悟，卻是作家年歲已長之後的告白。葉石濤深切領悟到，「要成爲一個名副其實的作家別無捷徑，你必須拋開一切人間美好的事物，忍受人們的嘲笑，顛倒晝夜，付出整個心靈埋頭寫作。」

伍、結論

文學讓我們看到生活中隱藏的事物，大敘述的歷史傳統掩蓋了台灣歷史真實的面貌，反而透過文學創作的觀察、審思和敏銳洞察產生的視野，更能著實呈現庶民生活巨細靡遺的多重面向。作家楊照曾說，葉石濤是台灣文學史上的一個異數。歷經白色恐怖人間煉獄的折騰，一位人道主義者的人性尊嚴和人性信念徹底摧毀，白白折損了十多年的文學生命。走過千錘百鍊的九死一生，沉寂了十多年的葉石濤，於一九六五年重新復出，創作風格脫胎換骨。面對人生際遇產生的憤滿、無奈、絕望，他以深沉又強烈的玩世不恭書寫文本，討論崇高、嚴肅的人生課題，揭露現實的真面貌，以自我調侃詮釋生命的荒謬，笑出黑色的幽默。我們在葉石濤身上看到了太宰治那般刻意割裂的人生態度一臉上裝著快樂，心裡藏著痛苦，懷著「天譴」的宿命，⁶³領先建構了《台灣文學史綱》，並以高超的勇氣突破政治禁忌，寫下自傳性小說《台灣男子簡阿淘》、《紅鞋子》，創造出《西拉雅族的末裔》喚醒了一個幾乎被全然遺忘的族群。他以那永不止惜的食獸夢的創作慾，真正創造出值得喝采，多彩、多元、多種族交響的台灣文學風貌。

⁶⁰ 同前註。

⁶¹ 同前引書，頁 197-198。

⁶² 同前註，頁 214。



附錄：葉石濤先生年表（1925-2008）

林慧妍 編

西歷	年齡	生平事蹟
1925	1	葉石濤出生於台南市。
1940	15	中學三年級，創作第一篇小說〈媽祖祭〉，投稿《台灣文學》，入選佳作。
1943	18	自台南州立第二中學（今台南一中）畢業，並應聘為《文藝台灣》雜誌社助理編輯。七月，於《文藝台灣》發表小說〈春怨〉。
1945	20	開始學習中文，並嘗試以中文創作。
1951	27	被依檢肅匪諜條例以「知匪不報」罪名判處有期徒刑五年，並於1954年因「減刑條例」獲釋。
1959	35	與陳月得女士結婚。同年，長子葉顯國出生。
1962	38	次子葉松齡出生。
1965	41	於《文壇》64期發表小說〈青春〉，復出文壇。
1967	43	調任高雄縣橋頭甲圍國小教師，自此定居左營。
1968	44	第一本短篇小說集《葫蘆巷春夢》及第一本評論集《葉石濤評論集》出版。
1969	45	獲第十屆中國文藝協會文藝評論獎獎章。
1977	53	於《夏潮》二卷五期發表〈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揭示「台灣意識」。同年，父親葉敦禮逝世（1898-1977）。
1979	55	與鍾肇政等人發起籌建鍾理和紀念館。 著作：《台灣鄉土作家論集》，遠景出版公司。
1980	56	獲第一屆「巫永福評論獎」。
1981	57	與陳坤崙、曾貴海、許振江、彭瑞金等人籌備創辦《文學界》雜誌。 著作：《作家的條件》，遠景出版社。
1987	63	《台灣文學史綱》出版，該書為第一本台灣文學史著作。
1989	65	以《紅鞋子》獲行政院新聞局金鼎獎。
1990	66	著作：《台灣文學的悲情》，派色文化出版社。
1991	67	自高雄縣甲圍國小退休。 著作：《一個老朽作家的五〇年代》，前衛出版社。
1992	68	獲得台美基金會人文貢獻獎，赴美領獎。
1993	69	著作：《不完美的旅程》，皇冠出版社。
1996	72	著作：《府城瑣憶》，派色文化出版社、《台灣男子簡阿洵》，草根出版社。
1999	75	獲頒成功大學榮譽博士。 著作：《從府城到舊城-葉石濤回憶錄》，翰音文化出版社。
2000	76	獲中國文藝協會榮譽文藝獎章、高市文藝獎、高市文藝貢獻獎、89年行政院文化獎等獎章，並出任文化復興運動總會副會長。同年，《台灣文學史綱》日文版出版。 著作：《紅鞋子》，春暉出版社、《西拉雅族的末裔》，草根出版社。
2001	77	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台灣文學館籌備處」推動「葉石濤全集蒐集、整理、編輯計畫」。同年，獲頒國家文藝基金會第五屆國家文藝獎。
2004	80	出任國策顧問。
2006	82	出版情色題材小說《蝴蝶巷春夢》。同年，國立台灣文學館與高雄市文化局出版《葉石濤全集》小說卷五冊。



2008	83	2月因直腸癌手術入院高雄榮總。同年，國立台灣文學館與高市文化局完成出版《葉石濤全集》二十冊。 12月11日，病逝，享年83歲。
------	----	--

主要參考資料：zh.wikipedia.org/zh-hant/葉石濤



參考書目

1. 葉石濤著，《作家的條件》，台北，遠景出版社，1981。
2. 葉石濤著，《不完美的旅程》，台北，皇冠出版社，1993。
3. 菲力浦·勒熱訥著，楊國政譯，《自傳契約》，北京，三聯，2001。
4. 陳明柔著，《葉石濤傳——我的勞動是寫作》，台北，時報文化，2004年。
5. 葉石濤著，《一個台灣老朽作家的五〇年代》，台北，前衛出版，1991年。
6. 葉石濤著，《府城瑣憶》，高雄鳳山，派色文化，1996年。
7. 彭瑞金著，《葉石濤評傳》，高雄，春暉，1998年。
8. 藍博洲著，《白色恐怖》，台北，揚智出版，1993年。
9. 葉石濤著，《台灣鄉土作家論集》，台北，遠景出版社，1979年。
10. 陳芳明著，《後殖民台灣》，台北，麥田出版，2002年。
11. 葉石濤著，《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1987年。
12. 葉石濤著，《台灣文學入門》，高雄，春暉，1997年。
13. 葉石濤著，《從府城到舊城——葉石濤回憶錄》，台北，翰音文化，1999年。
14. 葉石濤著，《台灣文學的悲情》，高雄鳳山，派色文化，1990年。
15. 葉石濤著，《台灣男子簡阿淘》，台北，草根出版社，1996年。
16. 葉石濤著，《紅鞋子》，高雄，春暉，2000年。
17. 楊照，《霧與畫——戰後台灣文學史散論》，台北：麥田出版社，2010年。
18. 葉石濤作，《葉石濤全集 1·小說卷》，高雄，高雄市文化局，2006年。

